

# 论《西游记》校改者唐鹤征

## ——读陈元之序（一）

胡令毅

（斯克德摩尔学院 外文系，纽约州 萨拉托加市 12866）

摘要：世德堂本《西游记》原有托名陈元之所作的序，但陈元之是谁，华阳洞天主人是谁，以及序中提到的唐光禄又是谁，因长期以来对陈序缺乏深入的研究，一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仔细剖析陈元之所作的原序，考证发现唐光禄乃唐顺之的儿子唐鹤征，唐鹤征不仅撰写了序，而且还修改并扩充了《西游记》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结论：《西游记》的原作者是唐顺之，修改者是唐鹤征。

关键词：西游记；陈元之；唐光禄；唐鹤征；庄子；华阳洞天主人

中图分类号：I207.419 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0)01-0062-08

### On Reviser Tang Hezheng of The Pilgrimage to the West —— Reading Chen Yuanzhi's Preface (Part One)

HU Lingy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Skidmore College, State of New York, Saratoga City 12866, US)

Abstract: The 1592 Shide Tang edition of The Pilgrimage to the West had originally a preface that was attributed to a seemingly real person by the name of Chen Yuanzhi. Due to the lack of in-depth studies on this preface, however, scholars have remained up to now uncertain or in disagreement as to who was Chen Yuanzhi, who was Master of Huayang Cave, and who was the official Tang Guanglu mentioned in the preface. After a detailed analysis of Chen Yuanzhi's preface to find out by textual research that Tang Guanglu was none other than Tang Hezheng (1538-1619), son of Tang Shunzhi (1507-1560), and he not only wrote the preface for The Pilgrimage to the West but also revised and expanded it. So comes to the different conclusion that The Pilgrimage to the West was originally written by the father Tang Shunzhi and was revised by the son Tang Hezheng.

Key words: The Pilgrimage to the West; Chen Yuanzhi; Tang Guanglu; Tang Hezheng; Zhuangzi; master of Huayang Cave; Paradise

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原有序，序作者为陈元之。陈序于胡适先生考证《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之后，已不受学界青睐。现在印行的各种《西游记》虽大体都依据世德堂本，却均不收陈序，即可见一斑。然而陈序之于《西游记》研究，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西游记》写什么，又是谁写的，我们至今仍在喋喋争论，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究其原因，实与我们对陈序之忽略大有关系。欲研究《西游记》，不始于此原序，反而倚重于后出的《淮安府志》等书，其之为不可靠，有如欲研究某国某地，不身历其境，实地考察，而依赖于道听途说，一鳞半爪之语一样。本文的目的，即返本归源，对陈序作一个仔细的审视剖析，希望通过这样的审视剖析，对大家所长期困惑的作者问题，能有所厘清。

### 一、陈序与《庄子》

先将陈元之序全文抄录如下，以方便对比，顺便也改正以前的断句之误。

刊《西游记》序

秣陵陈元之撰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谭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庄子曰：“（道）在屎溺。”善乎立言！是故“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若必以庄雅之言求之，则几乎遗《西游》一书。不知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

余览其意，近跻驰滑稽之雄，危言曼衍之为也。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岂嫌其丘里之言与？其叙以为猢猻，猢猻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戒

收稿日期：2009-10-03

作者简介：胡令毅（1957-）男，浙江余姚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国历史文学博士，现任教于美国斯克德摩尔学院（Skidmore College）外文系，主要从事明代小说翻译及研究。

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郭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此其以为道之成耳。此其书直寓言哉!彼以为大丹之数也,东生西成,故西以为纪。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流连比类以明意。于是其言始参差而詼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涯涘。而谭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夫不可没也。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十万言有余,而充叙于余。余维太史之意,道之所存,不欲尽废,况中虑者哉。故聊为缀其轶叙叙,不欲其志尽湮,而使后之人有览,得其意忘其言也。或曰:“此东野之语,非君子所志。以为史则非信,以为子则非伦,以言道则近诬。吾为吾子之辱。”余曰,“否,否,不然。子以为子之史皆信邪?子之子皆伦邪?子之子史皆中道邪?一有非信,非伦,则子史之诬均诬,均则去此书非远,余何从而定之?故以大道观,皆非所宜有矣。以天地之大观,何所不有哉!故以彼见非者,非也;以我见非者,非也。人非人之非者,非非人之非,人之非者,又与非者也。是故必兼存之而后可。”于是兼存焉。而或者乃亦以为信,属梓,成,遂书冠之。时壬辰夏端四日也。<sup>[1]</sup>

上面订正的标点文字错误共有 3 处:一误为“于是其言始参差而詼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涯涘”,改为“于是其言始参差而詼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涯涘”;二误为“一有非信,则子史之诬均,诬均则去此书非远”,改为“一有非信,则子史之诬均诬,均则去此书非远”;三误为“而或者乃亦以为信,属梓成,遂书冠之”,改为“而或者乃亦以为信,属梓,成,遂书冠之”。

陈序粗看并不难懂,其实远非明白晓畅。序作者学问渊博,语涉典故,此固然为原因之一,但最主要还是故布疑阵,游移其词所造成的障碍。比如序中提到“天潢何侯王之国”所指为何?又如序末所署日期“壬辰夏端四日”究竟是哪一日?此类疑点在序中比比皆是。此先提过,稍后再作详细论述。现在先集中考察序文中的引文及有关词语的出处。

陈序以引《史记》始。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谭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滑稽列传》)<sup>[2]</sup>,但马上又引《庄子》:“(道)在屎溺。”庄文出自《外篇·知北游》相关的原文段落如下: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

稊。”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sup>[3]</sup>

接着再引《内篇·齐物论》:“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sup>[3]</sup>

序作者似乎对《庄子》情有独钟。除上述引文之外,序中语出《庄子》而不加注明者,包括典故及难懂的词语,还另有 9 处,兹依前后出现的顺序胪列如下:

1 厄言。出《杂篇·寓言》:“厄言日出,和以天倪。”<sup>[3]</sup>

2 丘里之言。出《杂篇·则阳》:“少知问于太公调曰:‘何谓丘里之言?’太公调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sup>[3]</sup>

3 太初。出《外篇·知北游》:“若是者,外不观乎宇宙,内部知乎太初。”<sup>[3]</sup>

4 委蛇。出《内篇·应帝王》:“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谁何。”<sup>[3]</sup>

5 詼诡。出《内篇·德充符》:“彼且薪以詼诡幻怪之名闻。”<sup>[3]</sup>

6 谬悠荒唐无端崖。出《杂篇·天下》:“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倪。”<sup>[3]</sup>

7 涯涘。出《外篇·秋水》:“今尔出于涯涘,观于大海。”<sup>[3]</sup>

8 得其意忘其言。出《杂篇·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sup>[3]</sup>

9 非人。出《外篇·田子方》:“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惘然似非人。”<sup>[3]</sup>

陈序以引太史漆园始,又以子史之辩结束,前后遥相呼应,以明作者两者并重之用意。然细观行文,则又显见偏重于对道之阐发。上引录《庄子》章句,即显示其受庄周影响之巨。引文有出自《内篇》也有出自《外篇》和《杂篇》,共涉及 10 篇之多,作者之于此道教经典之熟稔,于此可见一斑。这自然不能不令我们联想到《西游记》的署名者,校者华阳洞天主人。华阳洞天是金陵南面位于句容境内的茅山一景,为道教圣地,校者使用这一道教色彩的化名,是不是暗示他和精于《南华经》的序作者陈元之有关联呢?

## 二、唐光禄考

过去已有人推测序作者陈元之很可能就是“校者”华阳洞天主人,但因缺乏必要的史实依托,尚未为大家普遍接受。其实无论是陈元之还是华阳洞天主人,都是假名,在历史上都是毫无影子可寻的人物。从假名到假名,即使推论得以成立,也仍无助于厘清事实的真相。我们能否从真实出发,立足于史实,来作一个研究呢?应该是完全可以的。因为陈序中虽然有不少的幌子和遮掩,毕竟提到了一个真

实的人,这个人就是唐光禄。我们现在不妨就从唐光禄来下手,看看能否解开作者之谜。

历来诠释章句,可分为二:一为诂释语词,一为考证本事。前者为释古典,而后者考今典。陈序之主要障碍,为大家所困惑不解者,主要在于“今典”。唐光禄就是一个棘手的例子。

唐光禄是谁?郑振铎认为是华阳洞天主人。惜乎语焉不详,我们仍不能够明白其真实的身份。孙楷第在《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一书中推断唐光禄就是刻印《西游记》的金陵世德堂书坊主。<sup>[4]</sup>他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呢?现在对于明代的印刷出版,已出了不少的研究书籍和文章,因此世德堂唐氏的名字不难查到。缪咏禾的《明代出版史稿》就提供了一份明代南京唐姓书坊主的名单,颇为详尽,兹转抄如下:

唐姓:唐对溪(富春堂),唐绣谷(世德堂),唐锦池(文林阁),唐鲤跃(集贤堂),唐鲤飞,唐少村(兴献堂),唐振吾(广庆堂),唐晟(亦称世德堂),唐文鉴,唐珩宇,唐廷仁,唐龙泉,唐廷瑞,唐建元,唐谦,唐际云。<sup>[5] 73-408</sup>

缪先生的这一份名单大体是依据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但又作了补充。从名单上我们可以看到,和世德堂有关的唐姓书贾有两位:一是唐绣谷,一是唐晟。其实唐晟是和兄弟唐昶共同经营生意的,所以应该说共有3位,但其中却没有叫唐光禄的。

有人指出,唐绣谷的“绣谷”并不是人名,因为不光世德堂刊印的《拜月亭记》、《五伦全备记》、《千金记》等署“绣谷唐氏世德堂(校)梓”,而且广庆堂的唐振吾等名前亦加署“绣谷”。绣谷,因其可以隐喻绣图刻书之地,很可能是指金陵书坊汇聚之地的三山街。(俞为民《明代南京书坊刊刻戏曲考述》<sup>[6]</sup>)不管此说正确与否,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有一位经营世德堂书坊的唐氏,其名字我们不清楚。这位唐氏究竟叫什么,有两种可能:(1)缪先生所提供的唐姓书坊主名单上已包括了他的名字,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就是世德堂的唐氏;(2)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缪先生的名单上。但这两种可能性都不能支持孙楷第所说的唐光禄就是世德堂书坊主的论断,因为这至少是缺乏迄今所能看到的可靠史料作为依据的。

不过,持唐光禄就是世德堂主人说的孙楷第等学者也并非完全架空而说,他们的依据大概就是陈元之的序。陈序明确说,唐光禄购买了《西游记》,然后校订刊印。“刊印”在原序里就是“梓之”。但“梓”并不是出版商的专用名词。我们现在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新书”,我们也可以说:“某某作者出版了一本新书”。同样,在明代,“梓”可以是指书贾或私人或官方机构的刻书,也可以指作者或代作者行使权利的人在书稿完成后加以出版发表的行为。在这里,笔者举一个明代的例子来说明。

公安三袁的袁中道写过1本书叫《游居柿录》,书中有一条这样的记载:

徐从善令人抄集刘玄度诗文凡十本,授予为梓。<sup>[7]</sup>

我们都知道,袁中道并不是什么书坊主,也不是有钱的私人刻书家。所谓的“授予为梓”,意思是把刘玄度诗文“交给我予以出版”,但这并不是说由袁中道自来承担刻书印刷的任务,而是说让他来负责安排出版此诗文集的事宜。至于究竟是由谁,私人还是书坊,袁没有说,不过肯定不会是他本人,因为他那时刚考中进士,已授予官职正在赴安徽就任的路上。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即陈序中的“梓”字,实际上并不能在逻辑上建立唐光禄和作为书坊主的世德堂唐氏之间一种必然的联系。

然而,唐光禄就是世德堂书坊主的这种说法影响很大,而这种影响导致了一个很坏的后果,就是大家不再去继续地深入地考察唐光禄的真实身份,有的中青年学者甚至竟误以为“光禄”就是世德堂唐氏的名字。对这一情况孙楷第先生显然是不能不负起误导的责任的。

唐光禄,唐为姓,当然没错,但光禄却不是名字,而是官衔。因此所谓的唐光禄,是指一个姓唐的光禄。这在明代大概是并不成为问题的。我们现在称某人为李部长,张处长,或王市长,大家都知道不是名字,不会搞错。同样,明朝人对于唐光禄指掌光禄寺的唐姓长官,同样也是如此。据陋见所及,明人没有用官衔作名字的,不过却喜用官衔来敬称某人,如吕吏部、胡少保、任光禄等等。只是现在去明已远,难免因制度的隔膜而产生误解。其实,“光禄”在明代是一个颇为常见的官衔。《明史·职官志》上有记载:

光禄寺,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正五品,寺丞二人,从六品,并其属若干人。卿掌祭享,宴劳,酒醴,膳羞之事,率少卿,寺丞官属,辨其名数,会其出入,量其丰约,以听于礼部。<sup>[8]</sup>

根据《职官志》,我们知道光禄寺共有长官5位,品阶最高的为卿,1人,次为少卿,2人,再次为寺丞,2人,因此陈序中所提到的唐光禄,只是一种简称,可以是指光禄寺卿,也可以指光禄寺少卿,也可以指光禄寺丞。不过这样的简称,通常只是用于卿和少卿。

明了光禄为官衔,而不是人名,大家就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历史上,于嘉隆万时期,截至壬辰年(1592年),陈元之写《西游记》序之前,是否究竟真有一位唐姓的光禄?这是关键之所在,也是笔者考证所要首先解决的。所幸的是,回答是肯定的,而且让人吃惊的是,这位唐姓的光禄不是别人,乃是我们所熟知的明代大名鼎鼎的唐宋古文大家唐顺之的儿子唐鹤征(1538—1619)。唐鹤征《明史》中有

简传 附顺之后:

子鹤征,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历官太常卿,亦以博学闻。<sup>[8]</sup>

“历官太常卿”就是说最后官至太常卿。简传未提及之前所任何种官职,故鹤征是否做过光禄,查《明史》并不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我们知道,万历《常州府志》系唐鹤征所撰。笔者通过校际图书的借阅服务,从芝大图书馆借到了该书的现代影印本。影印本前有一篇孙迎春写的《影印说明》,其中提到了鹤征的光禄职衔:

鹤征,字元卿,号凝庵,明武进士,抗倭英雄唐荆川之子。少以博学闻名,性格豪迈。明隆庆元年举人,五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历工部郎,光禄寺少郎,光禄少卿,太常寺少卿。因屡次上书陈事,受人妒忌,托病归里。<sup>[9]</sup>

孙文此段生平介绍,远比《明史》详细,惟不知所据何种资料。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里面有错误。光禄寺没有“少郎”一职,此为引录时出错呢?还是原本如此?这难免使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孙所载录的鹤征任“光禄寺少卿”一职,是否可靠?笔者的好友,河南大学图书馆的邢慧玲女士,在得知笔者研究《西游记》作者问题后,慷慨予以协助研究,并不惜时间,查考了《明实录》。下面所引万历十七年(1589年)二月和十月的相关记载,就是邢女士查考的结果:

二月,升尚宝寺少卿唐鹤征为光禄寺少卿。<sup>[10]</sup>(《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二百八)

十月,升光禄寺少卿鹤征为太常寺少卿。<sup>[10]</sup>(《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二百一十六)

《明实录》印证了鹤征曾任光禄少卿一职,并据《明实录》我们又知道了以下4点:一是唐鹤征担任光禄寺少卿是在万历十七年,即1589年;二是担任的时间从“二月”到“十月”,为8个月;三是迁光禄少卿前为“尚宝寺少卿”(从五品),而不是孙说的“光禄寺少郎”;四是任光禄卿8个月后,旋迁升,为太常少卿。

据《明史·职官志》太常寺的台正的为卿1人,正三品,并少卿2人,正四品。太常掌祭祀礼乐之事,总其官属,以听于礼部。凡天神、地祇、人鬼,岁祭有常。荐新则移光禄寺供其品物,省牲偕光禄卿。我们据此可以知道,太常寺和光禄寺一样,都“听于礼部”;太常寺主要管“祭祀礼乐”,而光禄寺主要管“祭享宴劳”;太常寺做祭祀活动常需光禄寺的配合。可见两者为兄弟单位,关系很密切,并有诸多重叠的部分。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鹤征用“光禄”,而不用“太常”,来隐指自己,因为一方面因其相似可以作权宜的代称,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过多的暴露。

明末黄梨洲(1610—1695)撰写的《明儒学案》,有一节专论“太常唐凝庵先生鹤征”,对鹤征所任官

职,记载颇详,可与孙迎春的《说明》互为印证:

唐鹤征,字元卿,号凝庵,荆川之子也。隆庆五年末进士。选礼部主事,与江陵不合,中以浮躁。江陵败,起历工部郎,迁尚宝寺丞,升光禄寺少卿,又升太常寺少卿。归,起南京太常。与司马孙月峰定妖人刘天绪之变。谢病归。万历己未,年八十二卒。<sup>[11]</sup>

梨洲提到鹤征任太常卿后,起“南京太常”。此与《明史》“历官太常卿”合,却与孙说的“太常寺少卿”不合。究竟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呢?

万历《常州府志》前有1篇鹤征写的序,尾署“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七月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两京太常寺少卿郡人唐鹤征撰”。万历四十六年即1618年,距鹤征去世只剩了1年,而且他那时早已辞官家居。所以据此可知他最后是官至“太常寺少卿”,不是“太常卿”。作者不会对自己的官职搞错,我们应以此为准。梨洲之所以致误,恐怕是未见《常州府志》而《明史》可能又是沿袭梨洲之误。

总结上面的考论,可以得到3点结论:第一,唐光禄确有其人,他的真名就叫唐鹤征;第二,鹤征最后官至正四品太常少卿,大概相当于现在中央部长或副部长级别的长官;第三,他并不是大家过去所误认为的普通平民商人世德堂书坊主的唐氏。(我们固然不能排除他与世德堂的唐氏或荣寿堂的唐氏可能有亲属关系,但以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尚不能加以证实。)

考论至此,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这就是有没有第二位的唐姓光禄呢?邢慧玲女士为此遍查了《世宗实录》、《穆宗实录》和《神宗实录》,答案是否定的。据她搜索的结果,惟见嘉靖时期有一县令名唐一岑者,于死后谥为光禄。不过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这位死的唐光禄排除出去,理由很简单,因为陈序所说的购书及梓行《西游记》的唐光禄,必定是活着的,决不会是一个死人。慧玲已收集了资料,专门就此问题写成了一篇论文,所以对唐光禄就是唐鹤征还有疑虑的读者,可以向她索取阅读,笔者在此就不再赘言了。

### 三、唐鹤征和《西游记》

自适之先生考证《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后,翻案者颇众,所可惜者惟不见及于鹤征。鹤征不想留名,甚至觉得用“唐光禄”来隐指自己已经过于显眼,故在稍后出版的,现保存于日本叡山文库的一种版本中,就干脆把序中敏感的留下蛛丝马迹的“唐光禄”给删去,改为“余友人”(见黄霖《关于〈西游记〉作者和主要精神》),后又托名虞集另写新序,将《西游记》的著作权完完全全地送给了长春真人。此是后话,先一笔表过。

我们现在既已揭开了唐光禄的神秘的面纱,就可以来考察这位光禄先生和《西游记》有无关系,究

竟是什么样的关系。鹤征在万历乙丑(1605)年编撰了《武进县志》其中特地撰有一篇《家叙》,上追唐氏之祖先至陶唐氏,下及其早夭之子唐傲纯。关于他自己,也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中丞公(即唐顺之)有子曰鹤征,少豪爽负气,不能卑伦侪俗,随人俯仰。或以势凌之,有头壁俱碎耳。早失怙恃,几为人所鱼肉,强不致陨越。年二十九受教于应城李先生,始闻危微下粟之论,稍涤其习气,未能尽除也。年三十而领乡书,三十四而成进士。授礼部主事。于时礼部僚友特多贤哲,相与效本实,励名检,为博古证今经世宰物之学。于权势之门,真若探汤避焰。鹤征独浅衷狭植,悯俗病时,偶有所触,不恤毁誉。故以此见于正人君子,亦以此取嫉于庸竖金夫。中以考功法,当谪,因自免归。久之,起开州同知,倅京兆,累升太常少卿。被劾,改南,复自免。盖生平所志,不在膺厚,亦不愿居功名。第冀少抒谋议,因机决策,转败为功,翛然长揖归田,其愿毕矣。竟未得一遇而败。幸而天假之灵,因先世之遗绪,玩古圣之微言,颇窥要眇。每有所得,辄自幸曰:“籍令媚世苟谐,不过公卿,安忍以此易彼也!”特其用志,凝神绝利,收功尚有待焉。<sup>[12]</sup>

这段自叙描写了他侠义豪爽,与时不合,志不在利禄,也不愿居功名,在历经了官场的沉浮之后,最后归隐田里。其中无一字提及《西游记》或相关的话题。惟“天假之灵,因先世之遗绪,玩古圣之微言,颇窥要眇”似语涉玄奥,为一般人不易明其所指为何(解释请看本文的最后部分)。如果仅以此叙述来作表面的推断,鹤征之于《西游记》竟是毫无关系的了。

然而我们不必忙于下结论,因为这样的表面结论,显然是和陈元之的序相抵触的。关于唐氏,陈序却是这样说的:

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盖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

寥寥数语,却语简意富,明确告诉我们唐氏为《西游记》做了4件事:购《西游记》订校,秩其卷目和出版。

先来解释一下这4件事。第一,购《西游记》。“购”乃伪托之辞,唐光禄购书是为了出版,但后文却说书亡佚了。如果亡佚发生在“购”以前,唐当然无从购起,如果发生在“购”以后,唐又何以修订梓行?可见所谓的“购”“佚”云云,显系托辞,并不可视为是真实的情况。但不管怎样,“购《西游记》”却至少可以说明,该小说原本就有,并非创自于鹤征。第二,“订校”。“订”为修改,“校”为校讎,所以细说是两件事。第三,“秩其卷目”。“秩”字点出了原书可能是不分卷回的,或者有卷目(如我们在阳至和本中所看到的那样),鹤征弃而不用,重新加以安

排。如是后者,则牵涉到了结构上的调整变动。第四,出版。我们现在既知唐氏的真实身份为地位崇高的中央官员,就可明白所谓的“梓之”,实应解读为“交出版商出版”最为恰当。在这4件事里面,1件是假的,3件是真的,尤其是第2和第3两件,对于明了鹤征在《西游记》成书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是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看过《西游记》世德堂百回本的读者,都知道原书上题有“华阳洞天主人校”的字样,只是没人知道这位使用假名的校者是谁。现在比对陈序中对唐氏的描述,大家不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谓的华阳洞天主人,他对《西游记》所做的是“订校”的工作,而唐氏对《西游记》所做的也是“订校”的工作,他们所做的难道不是一样的吗?我们如果因此推断他们为同一个人,难道不是完全有理由的吗?

但问题似乎并没有如此简单。大家一定会提出质问说,序中所说的“订校”者是“好事者”,并不是唐光禄呀!怎么竟然可以如此粗心而不顾原文,将他们扯上关系呢?这样的质疑似乎很振振有词,实际上却是站不住脚的。“好事者”为轻蔑的贬义之词,略具中文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华阳洞天主人确有其人,为唐氏所指派的“好事者”,读序至此,情何以堪?写序的人大概不会如此之笨,不给人留一点面子吧?所以恐怕还是我们作为读者的误读了。其实,“俾”在这里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为“使”,一为“顺从”,大家过去一般都按“使”的意思来解释,而正确的理解则应该是“顺从”,即“唐光禄顺从好事者(建议),为之订校”。故“订校者”并不是不同的人,仍然还是唐本人。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校者华阳洞天主人不是别人,乃是唐光禄鹤征先生。鹤征用层层包装作隐蔽,使研究者长期以来看不清他的庐山真面目。现在我们却让其真相大白于天下,这不能不说是从陈元之序出发,锁定实有其人的唐光禄,对《西游记》作者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收获。

而且这并不是唯一的收获。陈序向我们提供的讯息远不止此。我们继续仔细往下读,马上就又有第二个收获:唐氏不光校订了《西游记》,连序也一手包办了。这又何以见得呢?因为序中紧接着说唐光禄刊行《西游记》后,有一句非常奇特的话,却又一直不甚为大家所注意,透露了这个玄机。这句话就是,“充叙于余。”

古礼仪等级俨然,作序者又常为社会上有名望之贤达人士。故要求某贤达写序,通常都是说“请序”或“问序”,从不见有谁用过“充叙”。即使是前辈让后辈写序,也只是用“属序”。“充叙于余”按字面的解释就是,“(唐光禄)让我(陈某)来充当作序人。”试问有哪位替人写序者会如此撰文自贬身价的?故此“充”字实颇厉害,点破了陈元之系唐光禄的假名傀儡,真正的序作者乃是光禄先生自己

或以为不能光以常例来推论。此“充”字虽属异乎寻常,却不足以建立唐氏和陈元之之间的等同关系。为了使大家充分信服,笔者再举陈序中一个更为过硬的证据来说明这一问题。根据陈序对唐光禄的描述,我们知道《西游记》为唐所梓。原文中的“梓之”,“梓”为动词,“之”指代《西游记》,省略的主语则为唐光禄。对此大家应该不会有任何的异议。但序在最后却出现了这样的话:

而或者乃亦以为信,属稿,成遂书冠之。

在此出现了序中的第二个“梓”字,但“梓”的主导人却换了,已经不再是唐氏了。我们对此也可以来作一个语法分析。“或者”为主语,“属”为动词,“属”后面省去了宾语,而这省去的宾语和“梓”字共同构成了“属”的宾补结构。那么这省去的宾语所指为谁呢?根据上下文,显然是指序作者陈元之,而不可能是其他的人。因此,这句话的意思,翻译成现代的语体文,就是:“有人却认为可信,嘱咐[我,即陈元之]出版,书刻印成了,便写了这篇序冠于其首。”这还不清楚吗,出版《西游记》的唐光禄,到此已摇身一变,成了陈元之了!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这显示了在序作者的心目中,陈和唐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人,而根本就是同一个人!陈元之如同华阳洞天主人一样,只是唐氏的另一个化名而已。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又可以得出结论了:陈元之不是别人,他也是唐光禄鹤征先生。既然有:

唐氏 = 华阳洞天主人, 唐氏 = 陈元之,

那么我们又可以得到这样的推论,即:

华阳洞天主人 = 陈元之。

他们原来是“三位一体”的!所以过去陈君谋先生说,作序的陈元之实即校订者华阳洞天主人,实在是一点都没错。

笔者对于陈元之序,曾反复阅读,虚心查考各种资料,历时 1 年之久,虽不能说对每一个疑点都有了百分之百的圆满的解答,却都有自己的意见。前面的部分分析了唐光禄鹤征先生校刊了《西游记》并撰写了序,陈元之和华阳洞天主人都是他的化名,现在笔者要再进一步指出,鹤征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校者。谓“华阳洞天主人校”,“校”乃谦辞,出于谦卑而用,实际上鹤征对于《西游记》的贡献,远远超过“校”所能涵盖的范围。陈序对此有一个隐晦的交待,请看下面相关的原文:

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十万言有余,而充叙于余。余维太史漆园之意,道之所存,不欲尽废,况中虑者哉!故聊为缀其秩叙叙之,不欲其志之尽湮。

为了正确理解此段文意,我们还必须再回到“充叙于余”,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充叙于余”前已作了解释,意为“(唐光禄)让我(陈元之)来充当作序人”。对不对呢?当然没错,因为序言就是假

托陈元之作。但笔者又必须指出,“充叙于余”不只是有这样的一层意思。它其实是鹤征所玩弄的一个双关语的文字游戏,明里托言于作序,暗中却别有所指,巧妙地道出了他想要传递给读者的另一讯息。这个讯息就是,鹤征对《西游记》作了扩充的叙述。在“充叙于余”这个句子里,“叙”可以有两种意思,一为“序言”,一为“叙述”,而“充”也可以有两种意思,一为“充任”、“充当”,一为“充实”、“扩充”。所以整个句子又可以解释为:“(唐光禄)让我(陈元之)来扩充叙述。”扩充什么样的叙述呢?当然就是扩充唐光禄所“购”的《西游记》的叙述。

对于这样的诠释,大家大概不会轻易相信,下面就以“序”“叙”之别来作一个说明。

明代中晚期,文字的规范化,若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似乎越来越成为问题,尤其是在通俗作品中,异体字,别字,和随手拈来的形声字,触目皆是,不胜枚举。这里信手拾取一些例子,让大家看看和当今的正规写法有何等的差异:

(今)量赆域銜什嘆哲搭策实

(明)两帐或啣甚咲喆答筭柿

就以陈序而论,又何尝不是如此。比如“乃”作“迺”,“现”作“见”,“觀”作“觀”等等,不一而足。大家因司空见惯,遂误以为作者受时代之影响,以“叙”为“序”,不予深究。郑振铎先生在《〈西游记〉的演化》一文里,在引陈序时,甚至干脆就把“叙”改成了“序”,<sup>[13]</sup>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情况。然而实际的情形却并不是这样的。这只要看一下陈序的标题就可以一目了然了。标题是“刊《西游记》序”,用“序”而不用“叙”,可见对于序作者,“序”“叙”是有区别的,“叙”并非是“序”的同音假借!我们且想一下,如果“序”“叙”完全相同,作者何不将标题写成“刊《西游记》叙”,或将序文中的“叙”改为“序”呢?用不同的意指符号来指相同的被指,这在情理上没有必要,在逻辑上是不通的。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作者随手写来,漫不经心而导致了“序”“叙”并用所指为一的情况呢?也不可能,因为在序文中,“叙”共出现了 4 次。第一次的出现是在序的开始部分:

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作者姓氏之名。

其余的 3 次均见前引之段落。4 个“叙”中,3 个为名词,1 个为动词,而 3 个名词的“叙”,表面上似乎都可以解释为“序言”,实际上均暗指“旧叙”,即原来的《西游记》。大家只要细读上面“旧有叙”的引文,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是不署作者姓名的(只有 1 个校者的化名),而世德堂百回本的序则是署名的(秣陵陈元之撰)。如果“旧有叙”的“叙”是指“序”,后文的“亦”字就成了误用,因为同实际的情形并不相吻合。如果“旧有叙”的“叙”是指原有的《西游记》,后文用“亦”字就一点都没有问题,因为同实际的情形是完

全相吻合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叙”并不是随意使用的。序文中之所以用“叙”而不用“序”，无非是暗示读者，此“叙”并非那“序”，因为它含有那“序”所不具有的“叙述”之意。

鹤征实在用心良苦，一语双关而又不露破绽，让读者横看成岭侧成峰，可谓高明之至。我们按“叙”的两种意思来解读序文，都是同样的通顺。下面笔者按“叙”的本意将前面的引文（“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不欲其志之尽湮。”一段）翻译成现代的语体文，大家可以看到，读起来更是荡荡如流水，一点阻碍也没有：

唐光禄购得此书，大为钦佩，便听从好事者（建议）为之修改校订，标列卷目，刊行于世。共有二十卷，数十万言有余，由我扩充叙述。我因为书中含有司马迁和庄周的用意，关乎道之所存，不愿让它完全被遗忘，更何况还有一些较次的考虑呢。所以在亡佚的旧作之上加以叙述，使（原）作者的（遗）志不被湮没。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百回本《西游记》不光经过了鹤征的校订，分回标目，而且又经过了鹤征的充实扩展。鹤征之于《西游记》是作出了何等重要的贡献啊！郑振铎过去说：“《西游记》之能成为今本的式样，吴氏确是一位‘造物主’。他的地位实远在罗贯中、冯梦龙之上。”郑先生的话，只要把其中的“吴氏”改掉，换成“唐鹤征”，就一点都没有什么不妥当的。

以上考论鹤征，大体是依据陈元之的序，以分析内证为主，对于重视外证的学者，可能还嫌不足。所以下面再举一些陈序以外的例证，逐条分列，对鹤征之于《西游记》的关系，作一个补充说明。

1 华阳洞天为茅山一景，在句容县境内，而秣陵是南京的古称。句容和南京，两地相距甚近，故《西游记》的校者和序作者，地望似不相属而所指实可为同一个人。万历《常州府志》中管志道为鹤征《南游记》所撰的序，其中有句云：“惜句曲（即茅山）之晤，不及从容尽叩其微。然予入白下（即南京）两载，凡三见玄卿（即鹤征）。”亦并提两地以为暗示。此岂纯然为巧合耶？这至少说明鹤征如同秣陵陈元之和华阳洞天主人之地望所指示我们的，是一个在两地都生活过的人。

2 据万历《常州府志》孙迎春写的《影印说明》，鹤征有好几种著述，其中我们应特别注意他所著的《南华正训》。所谓《南华正训》即《庄子》训诂。可见鹤征之于《庄子》一书，是极有研究的。这可以说明为何陈序中有如此之多的《庄子》词汇及引文。而称《庄子》为《南华》即《道藏》中的别名，亦可证同其所用“华阳洞天主人”的化名，具有一脉相承之微妙关联。惟笔者未见《正训》，无法进一步阐述，只能俟诸将来了。

3 正统的观点将鹤征视为儒家名士，归阳明心

学一派。黄梨洲的《明儒学案》一书，所收人物颇有选择，但有专节详论鹤征，把他与其父亲顺之并列于“南中王门学案”之二。梨洲的学术立场似倾向于保守，故《学案》不收名震一时的李贽。但非常奇怪的是，这样一位醉心古圣的鸿儒，在介绍鹤征时，竟然提到了他对“稗官野史”的“究极”，实令人瞠目。请看相关的原文：

先生始尚意气，继之以园林丝竹，而后泊然归之道术。其道自九流，百氏，天文，地理，稗官野史，无不究极，而继乃归之庄生《逍遥》《齐物》，又继之乃归之湖南之求仁，濂溪之寻乐，而后恍然悟乾元所为生天地，生人物，生一生万，生生不已之理，真太和奥窔也。<sup>[11]</sup>

我们知道，徐渭在《自为墓志铭》中甚至都不敢直说他和“稗官野史”的关系，只能用“稗小”来曲指（“虽琐至稗小，妄意穷极”）。梨洲却毫无顾忌，明说鹤征“究极”“稗官野史”，可见鹤征为稗官野史中人，并在此方面有极大之成就，大概当时的文人都是知道的，无须掩饰。而一部有巨大影响的“稗官”，风靡于世，使鹤征小说家之名遂不能掩，《西游记》则毫无疑问是当之无愧的。

4 《明儒学案》选录了鹤征的《桃溪笥记》，笔者用心研读数遍，见有不少语体文的用法，奇之，加下划线录之于下：

- (1) 圣人却又推开了。<sup>[11] 607</sup>
- (2) 孔子总是善诱。<sup>[11] 607</sup>
- (3) 说来只是孔子的。<sup>[11] 607</sup>
- (4) 须要识得，然后养得。<sup>[11] 608</sup>
- (5) 曾点些儿活计。<sup>[11] 614</sup>

须知《桃溪笥记》非《朱子语类》或《传习录》之类的问答作品，故其夹以白话口语，实属怪异。此固然是承阳明学派之精神，以求心灵解放在文字上不拘一格的表现，但也清楚地显示了鹤征喜用语体文，以致在子学著作中也不避俗词俗语。据此可以推知，其之为修撰《西游记》这样的“东野之语”，可能性之大远非现代一般人的想象所及。

5 万历《常州府志》前冠以鹤征的序，序中有云：

余鹤征仕也，未尝操贤否之目，退也，未尝为月旦之评。人伦水鉴，实非所长；见闻几何，而欲扬摧今古乎？《春秋》一书，圣人独以知我罪我，听之人。

《春秋》一书所指为何？查鹤征所撰，记录在案的计有：《周易象义》《辅世编》《宪世编》《南华正训》《桃溪笥记》，《武进县志》《常州府志》等，而并无所谓的《春秋》这样一本书。故此书想必非正规的史乘，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其隐指为何书呢？陈元之序谓《西游记》含有“太史漆园之意”，又以“史”“子”并称其书，而我们过去几十年内，则一直把《西游记》目为游戏之作，鲜有对其用史之笔注意及之。现在根据陈序既知其有“史”的性质（此点稍

后会作详细的论述),而《西游记》又是经鹤征校订修改并重新创作的,故这部不见著录的《春秋》所指只可能是《西游记》,应该是无须置辩的。明鉴者其细察焉。

6 黄周星在《〈西游正道书〉跋》中说:“古本之较俗本有三善焉。俗本遗却唐僧出身四难,一也;有意续凫就鹤,半用俚词填凑,二也;篇中多金陵方言,三也。”<sup>[14]</sup>(见《西游记资料汇编》)请注意“续凫就鹤”一词,并不是成语“续凫断鹤”。“续凫断鹤”出自《庄子·骈拇》:“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意为违失事物本性,欲益反损。但黄周星的“续凫就鹤”却不是这样的意思。黄以“凫”来指代旧的短作品,以“鹤”来指代新的长作品,所以整个词语的意思是:“新(俗本)旧(古本)不一,改变旧作以成就新作。”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定要用“鹤”来指代新作呢?难道不可以用别的字吗?“鹤”即鹤征的名字,我们难道能说黄周星用此字不是在暗通款曲,特意点出修改者的真实身分吗?

7 万历《常州府志》载周弘谕《唐玄卿三集序》一文,明确告诉我们,《南游记》和《北游记》亦为鹤征所撰。请看相关的原文:

玄卿弱冠登坛,驰声海内,海内人士,无论知不知,咸以文章推委玄卿。夫玄卿岂只文章之士哉!口口口近有三刻,曰《家居》曰《北游》曰《南游》。

所谓《北游》和《南游》即我们现在所见的《四游记》中的《北游记》(又名《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和《南游记》(又名《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大家原以为两书都是福建书贾余象斗所撰,因为书内题“三台馆山人仰止余象斗编”。其实余象斗只是托名,故用“编”,而不用“撰”。“编”实际所指为合并刊印《四游记》。此何以见得呢?象斗在《东游记·八仙传引》中说:

不俗斗自刊《华光》等传,皆出于(笔者注:予)若改为“于”,意思全变)心胸之编集,其劳鞅掌矣,其费弘巨矣,颇为射利者刊,其诸传照本堂样式,践人辙迹而逐人后尘也。<sup>[9]73 408</sup>

其中用“刊”用“编”用“本堂”,均用只同编印发行有关之词,而无一语涉及他“撰”此诸记。如果此二书真出于象斗自撰,而又为其他书贾所盗印,他因该说:“其诸传照本著样式。”但他没有这样说,却

说“本堂”。这就清楚地显示了他只是一个搞编印发行的出版商而已。

或以为鹤征的《南游》和《北游》均为游记,而不是小说,实却不然。有万历《常州府志》中的管志道的《唐子〈南游记〉序》可以为证。管序以“有道术士”始,中有“记忆属辞比事为体”之语,未又描写唐子此记“集一时有道之选”,“记中描写精神”,“恍恍如见其拈理”,所言均指此记为一部阐明道学的作品,与《华光传》同,而与普通之山水记录不相类。所以《四游记》中《东游记》目前尚不清楚著者为谁(是否是《家居》的别名,待考),《西游记》为鹤征所校订,《南游记》和《北游记》均为鹤征所撰。

致谢:本文的写作得益于3位学者,在此一并致谢。首先感谢河南大学图书馆邢慧玲女士,没有她的敦促和提供资料,本文是不可能完成的。其次是芝加哥大学荣退教授余国藩先生,他对于道教的提示,促使笔者更深入地思考和探索相关问题,避免了可能的错误。最后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曹炳建先生,他不惜时间,回答了笔者有关于版本等方面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1] 朱传誉.善本小说丛刊:西游记专辑[M]/吴承恩.新刻出像官本大宇西游记(二十卷).台北:台湾天一出版社,1984
- [2] 司马迁.史记[M].简体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2423
- [3] 王先谦.庄子集解[M]/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北京:中华书局,1987.
- [4]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M].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
- [5] 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 [6] 俞为民.明代南京书坊刊刻戏曲考述[J].艺术百家,1997(4):198-205
- [7] 袁中道.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381
- [8]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9] 唐鹤征.常州府志[M].影印本.北京:线装书局,2003.
- [10] 明神宗实录[M].校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11] 沈洪善.明儒学案一[M]/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 [12] 唐鹤征.武进县志[M].南京:南京图书馆,1988.
- [13]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 [14] 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216